

我的经历

舍尔欣 著

人民音乐出版社



我的经历

〔德〕 赫尔曼·舍尔欣著

王 元 方 译

人民音乐出版社

HERMANN SCHERCHEN
AUS MEINEM LEBEN

本书根据亨歌尔出版社柏林1984年版译出

我的经历

(德)赫尔曼·舍尔欣著

王 元 方译

*

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

(北京翠微路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延文印刷厂印刷

787×965毫米 32开 48千文字 3印张

1983年2月北京第1版 1988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785册

ISBN 7-103-00101-4/J·102 定价：0.69元

我的名字叫赫尔曼·舍尔欣。我是柯尼斯堡大学的名誉博士，又是智利圣地亚哥大学的名誉教授。此外我曾在柯尼斯堡担任过音乐总指挥，一晃就是三年。实际上我出生于柏林，而且远在柏林郊外，正如我们所说的，出生于柏林-格本大街——一个漂亮的市郊区。然而我是出生于一个小酒馆里。我对当年的最重要的记忆不单是在格本大街上，而且是在边界堡垒的河边上。在那里我第一次拿到了一把小提琴，并在那里开始了我最为重要的经历。我的哥哥，他比我大七岁，当我自己六岁的时候，他因过生日得到了一把小提琴。这大大地刺激了我。我早就看出，他是没有兴趣玩这玩艺儿的，相反地我是非常喜欢玩，可是他得到了小提琴，因为他比我大七岁。三个月以后，我走到我父亲跟前并且对他说：“算了吧，你不该花钱去买小提琴，那是毫无用场的。阿尔弗雷德根本不想玩。就让我来学吧。”于是，那小提琴就从我哥哥那里落到了我手里。但这并不是我音乐爱好的起始。那起始比这早得多，也就是我三岁半的时候——至少人家后来是这样告诉我的。当我这么大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女仆——那时候还兴有女仆——和一个大院子。

每当她在厨房洗东西而我在她身边的时候，她就唱起歌来。她有着一本厚厚的包括300多首歌曲的民歌集，我跟着她一起唱。这意味着我从来不是唱曲调，而是在编造自己的曲调。这很快就出了名了，人们都跑来，为了听一听这个怪声怪气唱歌的小家伙。就这样，我在六岁半时有了我的小提琴，并且跟着一位非常和蔼可亲的小小男子汉学起来，这人名叫埃尔里希先生。当我跟他上了两年课的时候，有一天他带着一把大得多的小提琴到我跟前来，并且说：“小家伙，听着，这是一把中提琴。如果你想一想，那小提琴上的音符叫b，那么这同一个音符在中提琴上就叫c，而且要低七个音。现在你注意考虑一下，要是你经常低七个音演奏，那你就拉中提琴吧。”于是我就这样干了，半个钟头以后我按照中提琴的声音来演奏，那声音总是比小提琴上的低七个音。跟埃尔里希先生开始学习一事的重大意义是，我在十一岁的时候就把全部的72首海顿-四重奏都演奏完了。我的第一个十分重要的音乐经历是莫扎特单簧管五重奏中的小广板。当我第一次演奏完这美妙的旋律——美妙的旋律，美妙的旋律——的时候，我不禁潸然泪下。为什么，我不知道；因为我不只是被感动了，而且是如此地激动，如此地心旷神怡，恰恰是这个心旷神怡表现在流下的泪水中。我反复地演奏这个旋律。然而这个印象比之在一次学校音乐节上那音乐所给予我的

印象来就算不了什么了。在那次音乐节上一位年纪大一点儿的同学演奏了贝多芬的F大调浪漫曲。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曲子。那时候我还不到十岁。至于我听过这首F大调浪漫曲后发生了什么事，我只能这样说：我马上就把它抄了下来。如果有人熟悉柏林，那他会知道，什么是波茨坦大街，但他还不知道，这条大街过去是什么样子？它曾经一度是那最重要的交通大道，那时不论是马车或有轨电车都在令人窒息的速度中向那里飞驰。而我带着我所抄写的声部，那F大调浪漫曲的旋律，不是跑在人行道上，而是眼里噙着泪水在那紧挨着的车行道上跑，并反复地高声唱着我的F大调浪漫曲。——这就是我的几个起点：民歌、莫扎特和贝多芬。

正如我已经说到的，我出生于一个地地道道的柏林小酒馆里。这个小酒馆是千真万确的，因为当我是个五岁孩子的时候，有一天莽莽撞撞地跑到我爸爸那里，问说：“爸爸，怎么我们在那上头写着一个假名字呢？你和我一样不都是叫舍尔欣吗？可是我们在外边那上头写的是‘法朗茨·弹子台’啊！”那时候在柏林所有的小酒馆里都同样地设有法国弹子台，因此也就到处都在门面上写着：“法朗茨·弹子台”。

我们当时有一条很漂亮的达尔马提亚小狗——这是又漂亮又苗条带有黑点的白色丹麦哈叭狗。我们的狗名字叫卡尔。它是一个很粗暴的小哥们儿。

当春天来了的时候，任何东西在它面前都是不安全的，不单单是母狗。它是一只惊人的、亲近的动物。这里我必须简短地把住的地方写一写：我们的小酒馆位于楼房的底层，再往上走五个台阶就到了第二个房间，这就是有名的、经常黑着的弹子房。

然而这五个台阶对我来说是有特殊意义的。当我有了小提琴时，一有空就拉，坐在那第三个台阶上，而卡尔，我们的狗，它有着在当地到处都有的——我对这就不想多加解释了——那值得尊敬的称号“推动者卡尔”，它坐在更高一级的台阶上，并把它的脑袋搁在我的右肩上。

当我四岁半的时候，我已经一下子成了我们小酒馆里的一个名人了，因为我爸爸是一个相当开明的和有教养的人物，他对我理解事物能力强感到非常高兴，并在一段时间里教我学演算，学困难的演算，学乘法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作为幼儿一般认为这是完全不能够做到的。于是经常有些客人到我这里来，为了看一看这男孩子做了些什么样的非同寻常的演算，写了些什么样的非同寻常的东西。后来他们又来，为了听一听这男孩子是怎样拉小提琴的。然而不寻常的大事件是：我在小学里歌声是出了名的。我的声音在变声期以前由于我爱好音乐肯定是很有力气的，所以有一天老师宣布说……，不过我现在必须首先向你们说明一下我的这位老师。他有着一撮美妙的色彩斑斓里有点发红的山羊胡子

和一个平平的肚子。他是一位严格的、伟大的、坚强的人物，他做了下列的事情：在上唱歌课之前他每次都让一根令人惊异的竹棍子在空中呼啸，而那些不能唱歌的学生必须低头弯腰，而且挨上一棍子。这位“好”老师有一天走进来——这之前我又唱了《春天来了》——并且激动地说：“孩子们，注意啦，他将会一下子用他的歌声比你们大家一齐用你们的双手做出更多的贡献。”眼前对一个男孩子来说这可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我完全不是被鼓舞了，而是为此被深深地震惊了。这样一来就会是，我必须持续地试唱下去。这也就意味着，他要带一位他所喜欢的女老师一起来上课，而我一定要唱下去，并且要受到赞赏。

接着我的十分伟大的音乐经历就很快来临了。一下子被贝多芬感动了，一下子从莫扎特感到幸福，又从海顿受到鼓舞，就这样继续下去，使得我乐意学习了。可是我们家没有钱，家里的钱刚好够给埃尔里希先生的。我们的小酒馆是一个十分简陋的柏林小酒馆——吃一顿午饭只要花60芬尼。这包括一大杯子啤酒，肉加蔬菜和土豆，然后一小点糖煮水果，随后还有一杯牛奶咖啡：所有这些一共60芬尼。因此就只好至少把那每月的租金积攒起来。这就完全没有可能再让我继续去上小提琴的课了。然而我在当地学习音乐的孩子中已经是小名昭著了，于是有一天有人把我拖进了一所音乐学院。它

叫做施万才尔音乐学院¹。它在当时是柏林的第三个音乐学校。那原先的一个是音乐大学，那第二个是施特恩音乐学院，而第三个则是施万才尔音乐学院，它是由一位非常引人注目的人士、那荷兰的大提琴演奏家胡钦罗伊特²领导的。说起奥托·胡钦罗伊特，凡是涉及节奏的一切，我现在都要归功于他。胡钦罗伊特带着我们练习：“胡——钦罗伊特，胡——钦罗伊特，胡——钦罗伊特。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我们大家都逐渐地能把一种节奏收到我们的感觉里去，这使我们后来不论什么时候在小乐队里或者在管弦乐队里分析起音乐来都确实没有困难了。在这个音乐学院里我不是学生，而是一个可以炫耀的人物。我被用来展览表演小提琴，我必须参加四重奏，必须表演奏鸣曲，而当举行学生演出的时候，我也要表演小提琴独奏。那里有一位钢琴女教师，一位比较年老的夫人，她后来热情地邀请我，要我每个星期天到她家里去，并和她合奏。在她那里我熟悉了贝多芬的奏鸣曲，这些贝多芬奏鸣曲，听到它们我就震动、颤抖、哭泣和思考：凡是我在那里所感受到的，都是从未向一个人突袭而来的如此闻所未闻过的经历。随后我就变得非常冷静了，因为这时我决心要把小提琴拉得比任何别的人都更好。有一天我听说，在克罗尔³剧院里——这是柏林的第二歌剧院——将有一个神童出场表演：即那位十岁的小

提琴手法朗茨·冯·费茨赛⁴。我想去听听他。我从爸爸那里要了钱，买了一张入场券，弄到了一个站席，我处于极端强烈的期待中，并且在想：他甚至连你会拉的一半也拉不成。这时我心里完全麻木了，因为我觉察到，我什么也不会；因为他在当时已经是一位卓越的演奏能手，而我却从来没有练习的兴趣，只不过参加了合奏。从那时起我才知道：我绝不会成为一个小提琴家，但我要永远利用小提琴来搞音乐。对我来说最可怕的是弹钢琴。在钢琴上要练习三度音程——要花半个钟头的时间反复地在三度音程中上来和下去——这样一来我就几乎要痉挛了。后来我也就不管它了，尽管弹得这么差，但却是如此地有音乐才能——像我弹的这么差，但却如此地有音乐才能，这是很少有人能够做到的——我很快就弹完了那《平均律钢琴曲集》的全部前奏曲和赋格曲。

此后就是我新的音乐经历了——在这个巴赫经历之后，在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之后——就是比才的《卡门》了。而我的最大的幸福是，演奏了巴赫，紧接着又演奏和演唱了《卡门》。当我十三岁的时候，施万才尔音乐学院举办了一次大型的学生演出，而我，不是学生，而是个可以炫耀的人物。我必须提一提这个日程，因为它确实意味着我一生中的一个里程碑。我在这次演出中是第一次指挥那学生乐团演奏了莫扎特的《小夜曲》。此外我又为莫扎特的

d小调钢琴协奏曲指挥了伴奏。第三次我是作为独奏者出场的。我独奏了巴赫的g小调小提琴奏鸣曲中的序曲和赋格曲。接着我还作为作曲家最后出场。我们演奏了一组弦乐四重奏，演奏时我是拉中音提琴的。因此，我在这儿成了一个全面手，就如我从此以后一直坚持下来的那样，因为我永远都只是利用一切来搞音乐，而不是为了从事于技巧。

后来我又经历了一些非常奇怪的事。我花了九年功夫才学习到，人们是可以用来挣钱的。有一天一位同学来找我：“你，我妈妈说了，我要跟你学习小提琴。你拉得真了不起。”就这样他每星期上一小时的课，付出了30芬尼。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可想象的经历，人们居然可以用搞音乐工作来挣钱；这种经历，我的孩子们今天已经享有了。他们知道，如果妈妈为他们付出了很多钱，那么爸爸就必须再举行一次音乐会，以致我那最小的孩子最近对他的哥哥说：“如果爸爸死了，那你就经营小酒馆，而我来指挥音乐会，这样你就有钱了。”

这时，这个金钱的经历很快地在加强。就是说：当我长到十四岁的时候——在这次音乐会之后——，有一天有人来找我，并且说：“您听着”——当时我的变声期刚刚开始——，“您确实有这样好的音乐才能。这儿有一个合唱队，柏林的莫扎特合唱队，它演唱所有的清唱剧，可是它没有男高音。您来吧，来参加唱男高音。”为此我每晚上能获得

一个马克的报酬。于是我就去参加了，而且成了男高音声部的声部长。可是我那刚开始的变声期也同时跟着去了，而且过了不久就发生了以下的事情。我们演唱了门德尔松的清唱剧《以利亚》和门德尔松的《瓦普儿司之夜》，我们也演唱了海顿的《创世纪》，而且我的音乐才能允许我，如果女高音声部靠不住的话，就参加唱女高音，如果男低音靠不住的话，就唱男低音，而且如果女低音不行的话，马上就参加女低音——但总是在女高音声部里。这样，我总是在处理多个不同的声部；要说什么始终不变的话，那就是我的雄鸡高声叫着的嗓子。然而我却成了如此必不可少的人物，以致我为晚会的收入马上从一个马克变成了两个马克。我的收入在继续迅速地增加。有一天胡钦罗伊特院长来找我，并且说：“告诉您，这是卡斯泰尔夫人，是著名的银行经理的夫人，她听过您的表演——是我把您向她介绍的——她想要和您合奏。”她住在柏林最漂亮的市区里，即汉萨市区里，于是我每星期要跑去一次，在早上九点钟，同那位太太合奏两小时，而为此每次从她那儿得到一个金币。那时我是十四岁。而且我和她演奏了全部的室内乐：门德尔松——奏鸣曲，莫扎特——，舒伯特——，舒曼——，贝多芬——奏鸣曲。我在这当中感受到了我整个的音乐上的无限威力——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感受，是因为我漫游过了这些十分坚强有力的心灵。

我家的钱变得越来越少，生意也越来越差，终于有一天这个问题临近了，即如何为我的开支现在能很快地赚点钱。因为当初尽管我爸爸千辛万苦，他还是下了决心，让我从十岁起上了中学，可这是一定要付出代价的。当十五岁又三个月的时候，我参加了中学毕业考试。我当然乐意获得大学毕业证书，但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是这样发展下去的：我参加了——我相信是在一个星期六——我的考试。而在下一个星期一，我开始在柏林的齐迈尔大街、克罗泽咖啡馆的二楼上，作为必要的小提琴伴奏在一位非常亲切的、很有天才的音乐家亨利·代夫雷塞斯——一位荷兰的小提琴家——的小乐队里参加了演奏。这么一来我在十五岁零三个月的时候就每月得到了150马克的报酬。我还忘记了：在这以前我就已经挣了钱，非常正当地挣了钱。因为：当我在合唱队的时候，有人来对我说：“来吧，来参加诺伦多尔夫剧院的演唱”。——经理是当时非常著名的阿尔弗雷德·哈尔姆⁵——，“参加了那里的演唱，那你就可以在《浮士德》里参加城堡的青年贵族骑士们出场时的合唱了。”于是我化了装，虽然我才十四岁却有了一脸大兜腮胡子，并跑着唱男高音——我们八个人一边绕着圈子跑来跑去，一边唱着这支歌。我还有一个重要的经历：即荣幸地和约瑟夫·卡恩茨⁶合作，他是扮演《浮士德》中的魔鬼靡菲斯特的。当时——当我还在上小

学的时候——我就在那位给我金币的贵夫人那里挣了钱，并且参加了“诺伦多尔夫”剧院的合唱，此外还参加了其他合唱队的演唱，从而我每个月挣到了100马克，这就使我们的生活——我父亲病得很厉害——可以宽裕一些了。接下去，就像我已经提到的那样，从最下层起开始了我的正正当当的音乐职业生活，正如所说的那样美好，当十五岁半的时候在克罗泽咖啡馆里，在克罗泽夜咖啡馆里，每天晚上从九点到三点，每星期六从九点到四点，而每星期日从下午四点到第二天早上三点。

这使我丝毫没有受到损害，反而领悟到了一个新的世界。请您设想一下：我必须每天夜里三点钟穿过莱比锡大街走回家来，这条大街上住的都只是饭馆或者咖啡馆的服务员、音乐工作者或者是非常疲劳的夜班工人以及女仆们。我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对这种环境大多数人是毫无所知或者略有知道的。而我却天天生活在这里。

我在这里有着闻所未闻的经历。例如在那咖啡馆里有一位年少的大提琴演奏者，一位迷人的小伙子。他叫马克赛·施特恩贝格。他才十四岁，而我毕竟是十五岁又三个月了。马克赛·施特恩贝格的大提琴拉得非常漂亮。那时我没有钱，于是我来到了咖啡馆，这里就我们四个人。那乐队指挥穿着燕尾服，那弹钢琴的和马克赛·施特恩贝格每人穿着一身非常合身的、漂亮的大礼服。我因为没有钱买

衣裳，是穿着我那服役期一年的志愿兵考试的小礼服来的，颜色是淡黄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淡黄色的亨利，这首先遭受到了马克赛·施特恩贝格的无休止的嗤笑，他说：“这人真愚蠢，他从来没穿过黑礼服。”接着在合奏中发生了以下的事情：马克赛·施特恩贝格的确是一个有天赋的男孩子，他马上觉察到，从我身上散发出来一些他所热爱的东西，一些他想要，可他自己还不会产生的东西。这可首先是对待好人的一种痛苦的仇视，好人进来了，这种仇视就更加剧了，当两个星期以后那位乐队指挥说：“可是您听着，您曾对我说过，您是要当乐队指挥的。那么您来，指挥一下这《爱格蒙特序曲》。说着他作为伴奏小提琴坐下去，由我来指挥，而他们演奏起三重奏。这之后，马克赛·施特恩贝格就在地狱和天堂之间荡悠着。他不知道：应该不应该表明他的爱好。他表白的态度是，他总有一天要穿着大礼服大发雷霆的。我比他坚强得多，丝毫也没有做对不起他的事。结果是，他在三点钟结束的时候跑过来，脸羞得红红的，向我表示道歉，并问我，是否可以陪我回家去。于是我们俩总是——总是一块儿跑；因为他每天晚上都陪着我从克罗泽咖啡馆沿着整个波茨坦大街下去——经过莱比锡大街、波茨坦大街直到选帝侯大街。一路上大约要一小时三刻钟的时间。这倒无所谓。问题是现在马克赛·施特恩贝格还必须朝着那花园大街、矿泉

市区往回跑。这样他就每次大约要花两个钟头的时间。这时我也就活跃起来了。他问这问那，我也就说东道西。这以后，我们大多是不直接回家，而是先往上跑到矿泉去，接着再从矿泉经过动物园奔向选帝侯大街回到我的家，而他又重新往回跑，或者是搭上那早晨五点半已经开来的第一班公共汽车。遗憾的是，关于马克赛·施特恩贝格我就知道这么多，再无话可说了。

现在谈谈以下的经历：离开了咖啡馆，我熟识的朋友们来找我，并对我说：“你在咖啡馆演奏，真是瞎胡闹。来参加乐团吧。”为此有一天我下了决心，和几位乐团的音乐家们一块儿表演四重奏。我感到，我演奏得比他们好得多，然而这是不确实的。我在技巧上演奏得是不错，只不过比较精炼一点罢了。这就是说，我会的并不多，但运用得都比较好。我是非常积极的，非常爱好音乐的。有一天我走到布吕特纳乐团⁷主席的面前，对他说，我想在乐团里当实习生。那时我的年纪是十五岁又九个月，这是在咖啡馆的第一个阶段之后。他说：“孩子，来，表演点什么我听听。”接着又说：“那好，你来当实习生吧，一个月挣40马克。”从整个工资来说是比在咖啡馆差的；在咖啡馆我有150、120马克。可是在那里所有结了婚的人也都有这个待遇。于是我参加到乐团里来——有点发抖，我对音乐是如此尊崇。我和这个乐团第一次探讨的作品

是《自由射手》序曲。我开始有点发抖，而在四个小节以后我了解到，我的演奏甚至比其他的中提琴手稳当的多。我变得不是胆大妄为，而是稳当可靠了。我开始折磨起我周围的同事们。如果有人注意力不集中，我就哎哟一声；如果有人演奏得不准确，我就哎哟一声；如果有人“Fortepiano”的地方没有马上弱下来，我就哎哟一声。这时候，我经常用脚在下面踢那铺着竹管的椅子，我想要踢哪里，就直接向哪里踢。

真的，我开始和布吕特纳乐团在一起了，而在那里我从一种激动踉踉跄跄地步入了另一种激动里。在那里我在所有的指挥家手下演奏过，他们在音乐上塑造了1900年和1914年之间的德国面貌。我认为最有影响的音乐家是卡尔·穆克⁸，马克斯·费德勒⁹，里查·施特劳斯，西格蒙·冯·豪斯埃格尔¹⁰。我在乐团里是在1900年和1914年这一时期中所有居重要地位的名流指挥下面演奏的。我之所以说在乐团里，是因为我毫无疑问地不受布吕特纳乐团的限制，而是很快地就参加了交响乐团。在布吕特纳乐团里情况是这样，即我在四个月以后又走到乐团领导跟前，并且说：“请听我说，我是作为实习生来的，然而我演奏得确实至少和别人一样好，您一定要完全聘用我。”这时他又安排了一次试奏，而我马上拿到了120马克的工资。在布吕特纳乐团里一些知名人士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天